



寒山寺《金刚经》刻石(局部)

1 张即之《金刚经》以书艺著称于世

普林斯顿本因不在国内,加上图片资料有限,寒山寺刻石就成为了解张即之61岁书《金刚经》卷全貌最佳的途径。

读石可知,该卷成于南宋淳祐六年(1246),系张即之为追荐亡父而书,堪称其楷书精品。

1463年,明人陈谦见过此卷,认为此书是“宋朝名笔”,并说赵孟頫写经也以之为师,“览者不可草草视也”。

大收藏家董其昌也见过此卷,为之题跋是在他1620年乘船去苏州的路上。董其昌罗列了该卷百年间的流传史,称该卷“运笔结字不沿袭前人,一一独创”。董其昌还提到,与他同时代的毕熙志曾将该卷刻于石上,以志永久。

毕熙志是明代火器专家毕懋康之子。《金刚经》卷归入毕家后,极受珍视。毕懋康认为,张即之的书法“名并眉山(苏轼)海岳(米芾)诸公”,将之刻石,能够使精彩的书法免于“断灭”。毕熙志同意父亲观点之余,同样对张书给出高度评价。他本人的题跋则延请明末苏州人赵宦光用其擅长的草篆代写。

在篆书发展史上,草篆有一种趋向解放的意思,赵宦光是重要的推动者。跋文中他的文字,为此卷留下了晚明的时代风格。

不过这次刻石不是时候。没过几年,明朝灭亡,毕家刻石拓本零落,真假难辨。清康熙时期,毕熙志的后辈毕鼎臣在卷后留下一段话,除了感叹时世,还透露一个信息——在他手上,张即之书《金刚经》“易卷为帖”。毕鼎臣说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长卷的“损蚀”,便于展览。此后,这种装帧样式延续至今。

苏州寒山寺有一件“镇寺之宝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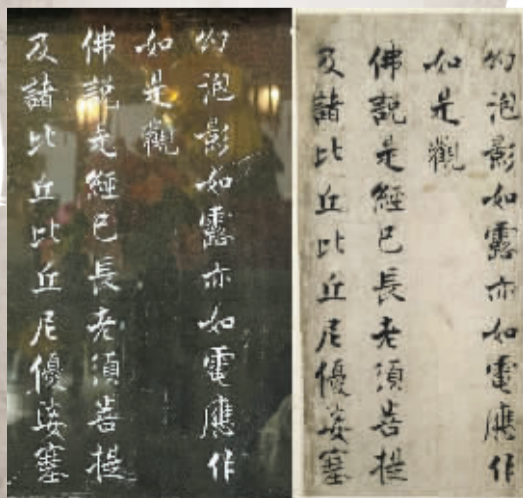
宁波人张即之书《金刚经》刻石

近日,记者途经苏州寒山寺,见寒拾殿两壁,陈列着南宋宁波书法家张即之61岁所书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(简称《金刚经》)的清代刻石。

张即之的书法,以大字、写经成就最高。其一生书写《金刚经》多卷,存世墨迹在日本京都智积院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、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。

比照多本,可知寒拾殿刻石的母本即普林斯顿本,有陈谦、董其昌、毕懋康、毕熙志、毕鼎臣、张廷济、林则徐、张应昌、俞樾、许懋身等多位名家题跋。

张即之《金刚经》刻石,镇江焦山碑林亦有其一。该书在清代反复被摹勒上石,不仅证明张即之书艺获得认可,也反映了清代崇尚金石的时代风气。



寒山寺《金刚经》刻本(左)和普林斯顿大学写本。

2 寒山寺刻石制作于晚清

张即之61岁书《金刚经》流传有绪。清朝之后,为该卷留下题跋的还有张廷济、林则徐、张应昌、俞樾、许懋身等多人。

张廷济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,他在跋文中讲自己几次见到张即之书法真迹,很有缘分。林则徐则将此卷与他曾见到的张即之《金刚经》焦山刻石相对比,表示此卷字体更大,“魄力”也翻倍。

焦山刻石与寒山寺刻石是清代两组经典的张即之《金刚经》刻石。焦山《金刚经》刻石位于今镇江焦山碑林博物馆内,有一个“独树一帜”的小院落。

这件《金刚经》原书于南宋宝祐二年(1254),张即之时年69岁,是他为妻子汤恭人所写的作品,书法采用行楷笔意,更加随意一些;而寒山寺刻本是他为父亲所写,更加恭敬庄重,是工整的楷体。

与林则徐看法相似,一位叫张应昌的浙江人同样认为,张即之61岁的这件比69岁的写得好,在考证流传原委后,张应昌用小字书于卷后,内容甚详。

在张应昌后留墨的是朴学大师俞樾,他模仿赵宦光书迹,用草篆书写跋文,成就一段翰墨因缘。

而最终回应寒山寺刻石年代问题的,出自全卷最后一段,杭州人许懋身撰、侄子许之轼书的跋文。这对生活于晚清的叔侄名不见经传,在得到这卷《金刚经》墨迹后,许懋身阅读前人留下的题跋,得知该卷曾在明代被刻石但很快流散的经过,发出了“世间好物不坚牢”的感慨。于是他请来张逸田、萧际清两位刻工,将《金刚经》再次磨勒上石,这就是如今寒山寺《金刚经》刻石的来源。

题跋书写于1885年,可知刻石完成亦在此年份。

3 曾为宁波人收藏也为宁波人所刻

该刻石如何从许家进入寒山寺,成为“镇寺之宝”之一?这个过程,苏州文史研究者诸家瑜曾加以考订:“晚清时期,这套石刻在社会上‘流浪’,民国时由高冠吾的夫人陈玄珠无意中购得。”

1941年,时任汪伪“江苏省主席”的高冠吾在修葺完沧浪亭后,拨款重修寒山寺。虔诚信佛的陈玄珠将珍藏多年的《金刚经》石刻施与寺中,嵌入壁间,便成为今天的样子。

而这卷写本则在辗转多手之后,流入美国。对于此间过程,过往材料言之不详。从收藏印看,民国时期,该卷曾经吴普心、周湘云两位收藏家递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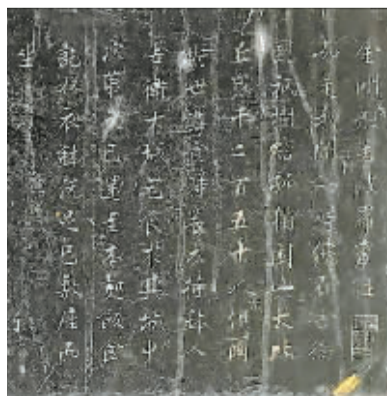
周湘云(1878—1943),号雪龛,生于宁波月湖畔,是上海有名的房产大亨。其人喜好收藏,从三代吉金到书画碑拓均有涉猎,怀素《苦笋帖》、米友仁《潇湘图》都曾是他旧藏。普林斯顿本《金刚经》上,属于周湘云的印章有“湘云秘玩”“湘云心赏”“曾经雪龛收藏”等。

出于宁波人之手,曾被宁波人收藏,张即之《金刚经》也曾为宁波人所刻。此人便是“鄞县五马”的父亲马海曙(1826—1895)。

清光绪八年(1882),时任丹徒(今属镇江)知县的马海曙到访焦山,看到了康熙四年(1665)由笄重光摹刻的张即之书《金刚经》焦山刻石,然见靠近墙根处的几块全行剥落,几无字迹。询问寺僧,马海曙得知,乃同治年间受战乱波及而毁,又悉焦山御书楼藏有旧拓,一字未损,遂命人根据拓本,易石钩泐,仍嵌原处,原石亦附于后。

马海曙将这一过程完整记录在石刻的最后,还将更换过的石头编号一一列具,可见其严谨精神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藏于焦山的张即之书《金刚经》刻石(局部)。